

丁平一 著

湖湘文化传统 与湖南维新运动

湖南人民出版社



湖湘文化传统 与湖南维新运动

丁平一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许久文

装帧设计:尹文君

湖湘文化传统与湖南维新运动

丁一平 著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岳麓区银盆南路 78 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长沙富洲印刷厂印刷

1998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13.5

字数: 337,000 印数: 1—1,000

ISBN 7—5438—1783—7

K · 327 定价: 15.50 元

序 一

戴 逸

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割让台湾，赔款银2亿两，主权尽失，国势一蹶不振，给予人们重大的创痛。为什么庞大又搞了30年洋务的中国竟失败在日本这个新兴小国之手？这不能不引起人们深入的思考。中国有一句老话：“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有志之士感到了进一步实行变革的必要性、迫切性。于是，中国大地上要求变法维新的浪潮勃然兴起，1898年产生了以康有为为首主持的戊戌变法运动。

戊戌变法运动虽然只有103天，时间很短，如昙花一现，但它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维新志士们奔走呼号，要求变法自强，期望国家和民族的振兴。在他们的推动下，清朝廷发布谕旨，实施新政，练新军，变科举，奖留学，开办京师大学堂，设立农工商局，一系列变法措施相继出台。变法维新因守旧派的破坏而告失败，但它确曾震动当时，令人耳目一新。人们盼望着能够更改旧制度、旧规章，摆脱死气沉沉的停滞生活，使中国自立自强，能与列强平等共存于世界。

中国是个大国，凡是全国性的政治思想运动必有地区的活动作其基础，为之先行。戊戌变法运动中，广东和湖南的知识界最为活跃。广东是中国与西方国家最早接触和交往的地区，西学传播最早，风气先开，故有康有为、梁启超及万木草堂的弟子们，

执戊戌变法运动之牛耳。而湖南自太平天国以后，显耀于世，人才辈出。特别是湖湘文化，博大精深，渊源有自，教育和启发了一大批维新志士。丁平一女士的《湖湘文化传统与湖南维新运动》即是研究戊戌变法时期湖南的维新运动及其与文化传统的关系。全书资料丰富，结构谨严，分析深入，颇有新意，是一部优秀的学术著作。从来的戊戌变法专著中对于地区的情况，涉及很少，丁平一女士补充了这一薄弱环节。她用全书绝大部分篇幅研究湖南的维新运动，透彻地剖析了湖南省的士风民气、官绅各界、维新精英；缕述了这里在戊戌变法前夕和期间的新政措施，诸如设学堂、办教育、创报刊，举办近代的矿业、交通业、邮电业、机电业、轻工业以及开算学会、南学会，设课吏馆、保卫局等等；并对维新运动中各个利益集团的分野，新旧两派的激烈斗争作了深入的分析；源源本本地介绍了湖南维新运动的全过程及其来龙去脉，大大地加深了人们对整个戊戌变法运动的认识。

丁平一女士还分析了源远流长的湖湘文化与湖南维新运动的关系。书中指出：湖湘文化的精髓在于爱国主义、变革精神、经世致用、敢为天下先等等。湖南的青年知识分子在这种文化氛围中受熏陶培养，脱颖而出，产生了像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樊锥、易鼎、毕永年、秦力山、皮锡瑞、蔡锷等一大批理想远大、见识卓越、勇敢坚毅、求新务实的维新志士，推动了全国和湖南维新运动的前进。

文化传统是某个地区的人民群众在实践活动中创造和积累的文明成果，凝集为特定的风气和精神。它形成于过去，积淀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却又存活在现实里，支配和影响着现实生活。人们都离不开传统，都要站在某种文化传统的基地上，进行今天的活动，创造今天的历史。当时的湖南为什么能得风气之先，在戊戌变法运动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这和湖湘文化的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正是这种优秀的文化传统更早地唤醒了他们的觉悟，使他

序

们更加关心政治、关心国家的命运，使他们更多地投身于经世致用的教育和实业活动中。丁平一女士比较圆满地诠释了湖南在近代政治和思想运动中为什么占有突出的地位。

今年正当戊戌变法 100 周年，我很高兴读到这部书，并愿意推荐给读者。

序 二

谭双泉

—

今年春夏之际，这部《湖湘文化传统和湖南维新运动》的书稿送到了手边。我虽在教坛上舌耕和走笔积以有年，然先睹为快的情趣依然弥坚。此时，窗外雨丝霏霏，穿林打叶，正恰似催人展卷开怀的“书酒”。在桌前灯下和字里行间，披寻着这百年话题中维新先辈们的孤怀遗恨，有时伏卷抬眼望去，岳麓山中那叠峰垒草之处穴结着云团雾簇，这不正像那需要理解的历史氤氲么？读到沉思处，又不禁神驰于当年变法的风云帐下，鼓角声中依稀听到这支百年老歌，读后颇有遐思。此书出自一位女性同志之手，历经三载，她孤坐于断卷残篇之中，终于从历史和现实的联系里走出了自己的路，其坚韧和献身精神更应珍惜引之。职是之故，我乐于就此多说几句，过及和不足之处，权充姑妄之言。

二

逝者如川，岁月不居。值此世纪之交临近的历史时刻，又要迎来“维新变法”的百年祭日，那时也是一个世纪之交。我们募

然回眸，辗转致意于这两个世纪之交的历史空间。当下的世纪之交，是我们昂首奋起、指点山河、重布日月向现代化高歌猛进的时代，而上一个世纪之交留下的屈辱和苦难又使我们不得不低首扣心、沉潜反思。一个向上的民族应该面对历史、总结过去以居安思危；一个自信的民族应该发幽显隐提示自身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以期做到补偏救失于来日。作为一个承负着文化传承使命的历史工作者，对此自应当仁不让。本书的作者感叹于百年前湖南发生这一场维新运动的兴衰起伏，当今尚无一部研究专著，意欲以此填补这项空白。这部书稿对湖南维新运动的研究，并没有沿袭一般的历史研究模式，而是采用了湖湘文化传统这一独特的视角，把文化传统和社会历史的变革联系起来，使之融为一体并贯注到全书的研究过程，这正是本书的一个显著特色。

发生在19世纪末叶的湖南维新运动究竟怎样受到湖湘文化传统的影响？这就需要考察一下它的若干特点：

首先，发起和参与湖南维新运动的主体力量具有一时趋同性。在以往的一些研究中，有一种观点，认为开始发起湖南维新运动的中心人物是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等，作者对此作了论述和考证。从当时实际情况看，省署陈宝箴、江标、黄遵宪、徐仁铸等一批当权人物是发动湖南维新运动的一股主要势力，他们大都来自江苏、广东沿海地区，且不同程度地带来了某些开放、维新精神，他们运用自己的权力和声威打开了湖南维新的局面。据陈宝箴的后人陈寅恪回忆：“咸丰之世，先祖亦应进士举，居京师，亲见圆明园干宵之火，痛哭南归，其后治军治民盖知中国旧法不可不变。”（见《寒柳堂集》第14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又云：“盖先祖以为中国之大，非一时能悉改变，故欲先以湘省为全国之楷模。”（《戊戌政变与先祖先君之关系》）这些地方当权者同上层绅士王先谦、张祖同、皮锡瑞、欧阳中鹄等结合起来，再加上激进青年知识分子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杨毓麟一

辈，这三种人各自怀着不同的思想动机，结合在一个维新救国的支点上，三种人早期的趋同性使他们构成湖南维新运动的社会基础。

其次，湖南维新运动的思想倾向，表现为新旧驳杂、中西融摄、趋时补苴、古今通汇的复杂性。主持大局的湘抚陈宝箴，亦如陈寅恪所述，其思想游移在曾湘乡和张南皮之间，不出“三纲六纪”范围。但在民族危机严峻形势下，他“首鼓吹革新之气运”（《知新报》评论），目的是为了维护封建君主专制主义免于崩溃。湖南士绅自咸丰以后得其湘军一系的荫庇而日盛，他们虽在维新运动中闻鸡枕戈，扼腕奋臂，以救中国非湖南的蛮霸之态自大，而其依归仍不出维护皇权、保卫孔孟。只要读一下王葵园（先谦）的《条陈洋务事疏》，就可以闻到一股浓烈的皇权仆从的酸气，他曾呼吁“非常之变，益非常理所能制驭。虽古圣处今日，其法不能不变也”（王先谦：《虚受堂文集》上，第16页）。谭嗣同、唐才常等激进青年知识分子则主张“起民权，撰议院，开国会”（樊锥：《开诚篇》三，《湘报》第24号），竭力贬斥传统的陋习，宣扬“西法与中法相参”，“民权与君权两重”（易鼐：《中国宜以弱为强说》，《湘报》第20号）等等。上述三部分人的思想倾向纷繁庞杂，尽管在维新自强这点上，可以进行感情和学理的统合，但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这些思想倾向的离异和顿斥又是不可避免的，这也正是湖南维新运动发生的一个脆弱的思想前提。

又次，湖南维新运动涉及内容的广泛性。从兴办近代工矿企业、交通运输、邮电、机电、轻工业、改革文化教育、创办新闻出版事业和新式学堂，到各种政治团体纷纷林立，尤其是激进派的言论不仅把改革推向政治法律宗教诸领域，并把触翼延伸到中国社会最具神秘感的婚姻伦理和现实中最忌讳的满汉关系等领域，乃至要求改变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和传统的价值观念体系，直

接指向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三纲”学说。这种要求几乎是全方位的但又不是社会结构性的变革运动，独自出现在一个国家的省级单位，的确是历史上所罕见。其结局当然也只能是萤火明灭，蒹葭白露，朝花夕拾，仅作兴亡之叹了。

最后，湖南维新运动从轰然而起到悄然而散的短暂性。这是由于内部的矛盾和外部环境所决定。从以上可以看到，投入维新运动的成员虽有地方权力阶层、上层绅士和激进青年知识分子，对整个社会来说，毕竟还是少数。如皮锡瑞云：“中国承平日久，积习相沿，忽闻变法改革，鼓舞者十之一二，腹诽者十之八九”（《师伏堂日记》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九日）。就是属于这少数的三部分人，也各有自己的利益中心和边缘警界。当运动的深入发展，一旦触及不同利益边界线，特别是摇撼了传统政治制度和伦理道德规范时，这些人的大多数又立即感到“毛骨悚然，芒刺在背，徬徨绕室，瞬息不宁”（欧阳中鹄：《辨疆文稿·批甄别湖南校经书院超等第十名何来保卷墨子商同三篇书后》，未刊稿本），从而揖别见背，“合久必分”了，剩下这屈指可数少数激进派也不能有所作为，运动只得风流云散。

当然这与周边的大气候也不无联系。从邻省看来，湖南的“维新”就像一枝出墙的蔷薇，其欲争春的气势声态，显然违背了“中庸”的古训。一室之内，众者酣睡晏然，岂容一人独醒？势必遭到反对者的猜忌和谤嫉。当时湖广总督张之洞对《湘报》激进文字的责难便是一例。一场声势浩大的维新变法运动只能成为昙花一现！

总起来讲，湖南维新运动的基本特点是：社会基础薄弱，思想倾向庞杂，牵涉内容广泛，持续时间短促，人们称之为“独步一时”，不无道理。这种轰然而起、悄然而散的社会政治变革运动的产生，有没有历史的必然性呢？回答应当是肯定的。

三

最近，江泽民总书记在美国哈佛大学的演讲中曾说：“中国在自己发展的长河中，形成了优良的历史文化传统。这些传统，随着时代变迁和社会进步获得扬弃和发展。”这对“中国人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中国的发展道路，具有深刻的影响”。上述“独步一时”的湖南维新运动自有它的社会经济根源，而受到湖湘文化传统的影响无疑也是深刻的。

湖南是一个内陆省，古代被称为“三苗之国”或“南蛮之邦”。明末清初，中国资本主义已有萌芽。在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的刺激下，民族资本主义有了初步的发展。特别是甲午战后，帝国主义的侵略魔爪由东南沿海和长江下游地区逐步延伸到内陆的城镇和乡村。这时湖南的岳州、长沙相继开埠，常德、湘潭、衡阳等地日渐成为商业重镇。在这种微弱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因素缓慢增长，而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形势下，就不时掀起了要求社会政治改革的浪潮。发生在19世纪末的湖南维新运动便植根在这社会经济基础之上。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反过来又影响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的发展。然而湖南维新运动究竟是怎样受到湖湘文化传统的深刻影响呢？

本书作者对湖湘文化的灿烂发展进行了合理的回顾与概括，即：强烈的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精神；求新求变的变易精神；重践履重实学的经世致用学风；卓励敢死勇为天下先的士风民气；流布湖湘的程朱理学等。实际上贯串于这五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即匡时恤民的爱国主义经世思想和浩然独立的变革精神，我认为这正是湖湘文化传统的本质涵义。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湖南就诞生过伟大爱国诗人屈原的《离

骚》篇章，曾发出“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岂余身之悼殃兮，恐皇舆之败绩”，“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等千古绝唱，这不能不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湖湘人士。北宋期间脍炙人口的《岳阳楼记》，更提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乃“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如斯不计自我得失，忧乐俱在天下之宏伟抱负，显然是对传统儒学理想人格的扬弃和发展。原来儒学主张“修、齐、治、平”以实现“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当这个目标不能达到时，则应有所节制，可屈可伸，可进可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这固然是一种自强不息，勇于进取，积极入世而又善于自保的高尚品德，尽管是唯心主义的说教，但却是一份厚重的文化遗产。它一方面蕴含着具有永恒力量的对真美善的追求，这个有历史永续性的内容是其积极因素；而另一方面它又包含着经世传统中的“穷独达兼”的文化心态，给人一种“清高自持”和“善于自保”的消极因子。湖湘文化传统中“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忧乐俱在天下之坚定志向，似乎扬弃了上述儒学理想人格中的消极因子，而继承和发展了它的积极成分。如章士钊在评价湖南人的文化性格时所说：“好持其理之所自信，而行其心之所能安；势之顺逆，人之毁誉，不遑顾也。”（《刘霖生先生70寿序》）

湖湘文化传统中的匡时恤民的爱国主义经世思想，到明末清初由思想大家王夫之进一步阐扬。他处在“地裂天倾”的艰难时代。激烈的阶级斗争和民族矛盾，彻底暴露了封建专制制度后期的痼疾，他明确揭示出，社会的严重危机主要来自皇帝、官僚和豪强三位一体的垄断统治：“夫财之所大患者，聚耳。天子聚之于上，百官聚之于下，豪民聚之于野。”（《宋论》卷三）这样，“聚钱布金银于上者，其民贫，其国危；聚五谷于上者，其民死，其国速亡。”（《读通鉴论》卷十九）于是要求革新和限制皇帝为

首的特权统治，“君非君，则天下不能息其乱”（同上书，卷三十），而“逆相为王，惩其不道而代兴，亦奚不可”（同上书，卷十九）！甚至发出了“不以一人疑天下，不以天下私一人”（《黄书·帝制第二》）的呼喊，把匡时恤民的经世思想提高到一个新的境界。

历史进入近代，经世派代表魏源，将匡时恤民的爱国主义思想赋予了新的内涵。如果说古代爱国主义是同反对民族侵犯、民族压迫相联系，那么近代爱国主义则主要是同反帝国主义的侵略与掠夺联系起来。魏源首次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开始冲破“夷夏之防”的祖训，动摇了几千年来崇尚“义理”、鄙弃“技艺”的陈腐观念。他说：“言学则尚致用而崇今文，言治则崇变法而非泥古。”所谓通经致用就在于“变法”、“利民”。并强调“复古愈尽，便民愈甚”（《默觚下·治篇五》）。把学习西方和变法图强相结合。正像梁启超在《论湖南应办之事》中所讲的：“欲兴民权，宜先兴绅权”，“今之西莫不如是”，“今欲更新百度”，“则必当复古意，采西法，重乡权”。换言之，要变法维新，必须把本土的古代文化传统（“复古意”）同学习西方的技艺与民主（“采西法，重乡权”）统一起来。这种中西结合，一方面使湖湘文化传统中的匡时恤民的爱国主义经世思想获得新的内容而有所发展；另一方面却又被套进了先期洋务运动中提出的“中体西用”的旧框架，从而使内容与形式暂时取得一致。恰恰是在这样的“中体西用”的方针指导下，湖南一部分较为开明的权力阶层、上层绅士和激进青年知识分子结为一体，共同发起了湖南维新运动。还是梁启超说得好：“湖南，天下之中而人才之渊藪也。其学者有畏斋、船山之遗风，……其乡先辈若魏默深、郭筠仙、曾劼刚先生，为中土言西学者所自出焉。近岁以来，官与绅一气，士与民一心，百废俱举，异于他日，其可以强天下而保中国者，莫湘人若也。”（《南学会叙》，《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

“中体西用”，在民族危机严重、反洋教斗争兴起的形势下，固然可以吸引社会各阶层来共同发起和参与一场生气勃勃、声势浩大的湖南维新运动，并使这次运动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为境内资本主义发展创造了某些有利条件，在湖南近代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中体西用”的局限性也是很明显的。它的内涵是“匡时恤民”、“师夷制夷”。既要革除时弊，又不能危及君主专制制度；既要体恤民隐，又需防范“闹教”，消弭人民反帝斗争；既要学习西方，又不能“惟泰西是效”。这是当时地主阶级改革派所能达到的最高认识水准。即使是代表新兴资本主义因素的激进派思想，也不可能懂得依靠人民的力量去抵御外侮、救亡图存。他们认为，“即不能兴民权，亦当畀绅耆议事之权。……苟有绅权，即不必有议院之名已有议院之实。”（《谭嗣同全集》第471页）这表明激进派要求走资产阶级议院制道路的改革趋向。这正是当年湖南维新运动的主体力量在继承和更新湖湘文化传统中的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又恰恰是这种局限性导致了湖南维新运动的失败。

由上可见，湖湘文化传统与湖南维新运动的联系是极为复杂而多向的。湖南维新运动的发起者们得益于湖湘文化流传下来的社会感情、认识方式和思想精萃，昂首阔步走上了近代维新的舞台，但又是这个文化传统的消极因素促使他们裹足不前、畏首畏尾甚至抱恨终生。究竟怎样正确认识和对待传统，并使之在中国现代化的行程中发挥它应有的作用？这可能是本书作者多年耕耘的现实意图。我认为她是比较圆满地实现了自己的写作目标。当然不是说本书不存在任何缺点和不足，这只能留给读者自己去评说了。

湖南维新运动已过去100年。经历了整整一个世纪的艰难险阻的巨变，当今的湖南和中国已获得彻底的新生！然而，如何对待我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仍然是一个古老而常新的问题。江泽

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说：“中国文化有着辉煌的历史。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我们一定会创造出更加绚丽多彩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对人类文明作出应有的贡献。”无疑地，这种“创造”应包括对历史文化传统的继承、改造和创新的艰苦工作。我完全相信，在党的十五大精神的指引下，将会出现更多的、更加绚烂的诸如此类文化方面的力作。是为序。

1997年11月于岳麓山

引 言

中国维新运动已整整过去 100 周年了，100 年前，维新改革先驱用他们的呐喊、鲜血，甚至生命，警醒了自鸦片战争以来，还盲目以泱泱大国自居而不思改革的中国人。维新志士们将改革的目光第一次投向了政治体制改革。他们悟出了一个自鸦片战争后中国人早就应该悟出的道理——腐朽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早已严重阻碍了社会的进步，残酷扼杀了国家的生机，只有改变封建政体，中国才有强盛希望！

而湖南，在中国近代维新运动史上占有相当突出的地位，有人评价湖南在维新运动中是“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其时也有人称颂：“振支那者惟湖南”、“可仁可侠者惟湖南”，而湖南的维新志士也慨然抱着“救中国从湖南始”、“吾湘变，则中国变；吾湘存，则中国存”的殉道气概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湘省维新运动，从而使研究中国近代维新运动史的人自然而然将研究焦点投向了湖南维新运动。当笔者亦将目光投向此时，发现尚未有一部独立的专著详细记录下湖南的第一次近代化运动，故不揣鄙陋、笔耕数年，在纪念戊戌维新 100 周年之际，向读者呈现是书，并以此纪念为维新变法而献身的改革先驱！

本书参阅了诸多前辈的研究成果，阅读了大量维新志士的著作，从珍贵的史籍中寻觅着维新派改革思想和改革实践的轨迹，从而产生粗浅的心得而探讨了一些理论与实践的问题，如：湖南

维新运动为什么会“独步一时”？湖湘文化传统中的“独立根性”与“独步一时”的湖南维新运动之间有何深刻内在联系？湖湘文化传统中有哪些优秀遗产对维新运动产生了积极影响，而又有哪一些消极因素阻碍了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官、绅、士的联手行动对运动产生了什么作用？各项近代化新政产生的条件、经过、结果如何？湖南维新运动的特点及其“兴”、“衰”原因何在？等等问题都成为笔者所关心的对象。

戊戌维新变法 100 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再回顾往事时，我们依然强烈地感到：百年前的改革运动仍可以给我们今人以许多深刻启示，百年来，有多少维新改革志士在苦苦追求强国富民之道，又有多少维新志士用鲜血和生命去完成他们的理想和信念。同时，一种莫名的惆怅也不由在心头萦绕：我们是否有愧于筚路蓝缕开辟改革之道的先人？我们如何才能毫无愧色地面对将给我们作出历史评价的后人？